
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综述^{*}

Review on the Researches of Planning and Recovery of Capital Dadu of the Yuan Dynasty

徐斌

Xu Bin

内容提要：

本文综合考察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相关资料，对历史文献、历史地理、考古、建筑与城市规划史等多学科成果进行逐一评述，为进一步开展元大都研究奠定基础。基于对研究现状的回顾和总结，提出未来可以从元大内规划复原研究、元大都“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研究、元大都到明北京的空间变迁研究等方向推进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

关键词：

古都北京 城市规划 历史文献 地理 考古 建筑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f the planning and recovery of the capital city Dadu of the Yuan dynasty (1272-1368), such as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historical geography, archaeology,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view, possible directions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f Dadu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recovery of the Palace City, the research on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Modeling Heaven and Earth” of the capital’s planning,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Dadu to the Capital Bei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KEYWORDS:

Old Capital Beijing, city plann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geography, archaeology, architecture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80813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6M591132）、北京市社科基金（19YTC037）资助。

蒙元时期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至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而走向分裂。最终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于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大都”。随后,元朝政权持续了97年,至1368年被明军逐出汉地,逃往漠北,史称“北元”。北元政权又延续了267年,直到1635年才被后金灭亡。蒙元时期共有四个都城,按照修建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哈拉和林、位于今中国境内内蒙古地区的元上都、北京地区的元大都,以及河北地区的元中都。其中,元大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会之一”¹,其规模宏大,形制规整,且是平地新建的城市,在规划上具有完整性。元大都的规划设计,融合汉、蒙文化,吸纳中亚、阿拉伯科技,可谓集各家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典型,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²。从规划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元大都“上承北宋、金源,下启明、清,在宫殿制度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宫殿制度的渊源演变颇具重要性”³。同时,元大都的兴建作为北京建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奠定了北京地区作为全国首都的基础,“城址的选择和城市的平面设计,直接影响到日后北京城的城市建设”⁴。

元大都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营造学社朱启钤、阚铎、王璧文及中央大学朱偕等学者基于文献的研究为代表。6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共同开展元大都考古勘探,发表了一系列考古报告。90年代至今,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和新近成立的考古研究所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发现了一系列元代和明初的建筑基础。总体看来,元大都作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受到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针对元大都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历史文献、历史地理、考古、建筑与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视角丰富,成果丰硕。其中,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对修建过程和关键人物思想等已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基于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和考古成果的互证,在区域尺度,初步明晰了历史地形、水系、交通、人口等情况;在城市尺度,针对元大都的中心、轴线、城墙、街道、水系、街坊,以及宫殿、官署、仓库、园林、坛庙、寺观、市场等重点功能区形成了多种复原方案。基于建筑和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对建城思想、都城选址、空间布局和宫室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元大都研究的重点、难点和争论的焦点在于明晰其规划思想和复原其平面布局,本文将其称之为“规划复原研究”。由于元大都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式的古代城市遗迹”,考古工作的开展相对被动,并不充分。元大都的规划复原方案,由于缺乏考古实证,始终存在争议。对此,一方面需要补充新的考古材料,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获得新的认识。研究发现,元大都与金中都、元哈拉和林、元上都、元中都、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在规划模式上存在继承和延续。这些都城的考古和规划研究成果,可以为元大都规划复原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综合梳理元大都研究相关的多学科资料,在此基础上提炼元大都规划复原的关键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元大都研究奠定基础。

1 王岗:《元大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2 徐莘芳:《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3 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4 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一 历史文献

有关元大都的历史文献非常丰富,包括官修的史书、政书、地理志,私撰的地记、方志、游记、杂记、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包括当时外国人游历元大都之后的记录¹。其中,元代、明初文献为研究元大都空间格局提供了直接证据;明清至近代以来的著作和辑注,虽然在流传中难免错讹,但仍然是今天开展元大都研究的坚实基础,可以与其他学科的材料统一考虑,甄别比较,为元大都空间格局的复原以及建城思想的探究提供有力的证据。

(1) 史书:《蒙古秘史》是用蒙文写就的“黄金家族”家谱档册,主要记载了窝阔台之前的蒙古族发展的历史脉络²。(波斯)拉施特《史集》所载《蒙古史》部分,对研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特别是忽必烈时期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³,以上两书目前已有中文译本。明初宋濂等所著《元史》,系统记载了元朝兴盛至灭亡的历史。其中《本纪》部分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子孙修建和完善大都城的过程;《地理志》对大都路的沿革和府、县、州等建置有简要介绍;《河渠志》详细记载了元大都的主要河流,是复原大都历史水系的重要材料;《列传》和《释老》涉及元初名臣刘秉忠、许衡、郭守敬,国师八思巴等人的生平事迹,可以为从人物史角度研究元大都建城思想提供材料⁴。

(2) 政书:《元典章》涵盖了元宪宗至元仁宗时期的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文献资料。其中“诏令”部分包含“中统建元诏”、“建国都诏”、“至元改元诏”、“建国号诏”等,直接反映了元大都规划建设之际的政治文化面貌;“工部”部分则包含桥梁、道路、城墙、官署、寺观的营建制度⁵。

(3) 官修地理志:《大都路图册》是元代大都路总管府官修的地方志,原书应有文有图,惜已失传。今存《元一统志》中多处引用,内容涉及元大都山川、寺观、桥梁、关隘、冢墓、古迹等。《元一统志》为李兰盼等撰,成书晚于《大都路图册》,是元代官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全书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对研究元大都的空间布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⁶。明清两代北京地区的官修地理志书,也可作为研究元大都的辅助材料,如明洪武初年刘崧编撰的《北平府图经志书》(已佚)、明永乐、万历以及清康熙、光绪年间官修的《顺天府志》等⁷。

(4) 地记、方志、游记、杂记等:元代李洵孙《皇元建都记》(也称《大都赋》)作于大德二年(1298),距离元大都建成仅十余年,是佐证“元大都方位制度”的核心文献。全文从天文、地理、风俗、方物、遗迹、都城、职贡、兴农、出行、游猎等方面,全面介绍了元大都的风貌和文化。其中地理部分,分为远郊及近郊

1 王灿炽:《燕都古籍考》,京华出版社,1995年。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杨讷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4年。

2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

4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元]不著撰人,陈高华等校点:《元典章》,中华书局,2011年。

6 [元]李兰盼等著,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

7 [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出版社,2015年。

两个尺度。都城部分,分为轴线、城墙、道路、城坊、宫城、庭、水系、御苑、宗庙、官署、对外交通、市场等十二个部分。还特别记载了元大都主要功能区“象天法地”的规划布局¹。元末熊梦祥《析津志》,对大都的城垣街市、朝堂公宇、河闸桥梁、名胜古迹、人物名宦、山川风物、物产矿藏、岁时风尚、百官学校等有翔实记载,是研究元大都的重要资料,原书早已失传,经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汇为《析津志辑佚》出版²。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元代社会的诸多掌故,对于了解元代社会生活很有价值,其中“宫阙制度”一卷详细描述了元大都的宫殿布局 and 形制³。陶氏还撰有《元氏掖庭记》,记述了元宫廷的建筑和生活⁴。元人王士点《禁扁》,录有元宫殿名称,可作为研究元大内规划布局的参考资料⁵。

明初洪武年间萧洵奉命拆毁元宫殿时,作《故宫遗录》,对元宫殿的门阙、楼台、殿宇、苑囿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复原元宫城及苑囿的重要依据⁶。由于明北京城与元大都南半部相互叠压,因此,明代北京地方志、游记在述及山川地理、城市沿革、文物古迹等内容时,或多或少会对元代遗迹进行回顾和分析,这为研究元大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不著撰人《北平考》⁷、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⁸、沈榜《宛署杂记》⁹、蒋一葵《长安客话》¹⁰、刘若愚《酌中志》¹¹、孙国敕《燕都游览志》¹²和刘侗等《帝京景物略》¹³等。

清康熙年间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博采群书,搜集了许多关于元大都的珍贵史料。乾隆年间经于敏中等修编,定名为《钦定日下旧闻考》,收入《四库全书》,被誉为“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¹⁴。吴长元《宸垣识略》在上述两书基础上,根据实地考察,进行了增补和修正,并补充了若干地图,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¹⁵。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北京地区的历史遗迹,著作《北平古今记》、《万岁山考》,资料详实,考据精审,对研究元大都建制、沿革、发展演变有较高价值¹⁶。同样,清人游记、杂记对元大都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比较代表性的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¹⁷、《天府广记》¹⁸等。

故宫博物院藏相地类书籍《平砂玉尺经》¹⁹和《水龙经》²⁰,同为明代刘基注解,前者被传为元代刘秉忠所著,后者著作时代更早。两书一重地形,一重水脉,包含了以天象格局定地理形势的内容,可以作为从“象天法地”

1 [元]李清孙:“皇元建都记”,载[清]于敏中等编撰:《钦定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2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

4 [元]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载[元]陶宗仪:《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 [元]王士点:《营造经典集成(第四辑):禁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6 [明]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出版社,1963年。

7 [明]不著撰人:《北平考》,北京出版社,1963年。

8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9 [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11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 车萍萍:《北京历史文献的辑佚学研究》(硕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

13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 [清]于敏中等编撰:《钦定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15 [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北京出版社,2015年。

16 车萍萍:《北京历史文献的辑佚学研究》(硕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

17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19 [元]刘秉忠述:《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海南出版社,2003年。

20 [清]蒋平阶辑,李峰整理:《水龙经》,海南出版社,2003年。

视角研究元大都选址和布局的基础材料。

(5) 文学作品：元朝苏天爵所撰《元朝名臣事略》收录了元朝开国功臣等四十余人的传记，为从人物史角度研究元大都提供了细致的材料¹。苏氏还编有《元文类》，收录了元代著名文人的诗、文八百余篇²。此外，元人文集如刘秉忠《藏春集》³、王恽《秋涧集》⁴、张昱《可闲老人集》⁵、赵孟頫《松雪斋集》⁶、虞集《道园学古录》⁷、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⁸、郝经《陵川集》⁹、姚燧《牧庵集》¹⁰、张养浩《归田类稿》¹¹等，包含了与元大都和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元宫词和元曲中也包含了大量与元大都相关的诗词曲赋，如元人柯九思所著《辽金元宫词》¹²、明初朱有炖所著《元宫词》¹³、明人藏懋循所著《元曲选》¹⁴等。

作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元大都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他们在游历元大都之后留下行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大量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大都城的描述¹⁵。

二 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的研究勾勒出元大都范围内的山川形势、交通走向、水利设施，是元大都选址定基的地理基础，也是元大都规划构建整体空间秩序的依据。北京历史地图、地形图、航拍照片，为复原元大都空间格局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在GIS技术的辅助下，整合前人在元大都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建构区域数字地理模型，可以生动地展示元大都规划之初的历史地理空间信息，以探求元大都选址规划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著的《北京古地图集》包含了宋、元、明、清四朝至1949年的关于北京的中外古旧地图¹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舆图汇集》包含了清康熙至光绪年间的北京历史地图；其中，清咸丰年间（1851～1861）《天津至京都水陆地里全图》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包含了元大都北半部城墙的公尺丈量地图；光绪年间（1903）《北京城图》是由德国人测绘的北京地图，同样绘制了当时都城北面的元大都城墙遗址¹⁷。1943年北京城区航拍图和1949年北京城图，也清晰地保留了城市北部遗存的元大都城墙遗址，1917年民国时期《京

1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1996年。

2 [元]苏天爵：《元文类》，商务印书馆，1936年。

3 [元]刘秉忠撰，李昕太等点注：《藏春集点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

4 [元]王恽著，杨讷编：《秋涧集》，中华书局，2014年。

5 [元]张昱：《可闲老人集》，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文渊阁本。陈学霖：《张昱辇下曲与元大都史料》，载陈学霖：《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6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7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

8 [南宋～元]汪元量著，孔凡礼编：《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

9 [元]郝经著，杨讷编：《陵川集》，中华书局，2014年。

10 [元]姚燧著，杨讷编：《牧庵集》，中华书局，2014年。

11 [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文渊阁本。

12 [元]柯九思等著：《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

13 [明]朱有炖著，傅乐淑注：《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4 [明]藏懋循编：《元曲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 [意]马可·波罗著，[法]沙海昂译，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2012年。

16 中国国家图书馆、测绘出版社编著：《北京古地图集》，测绘出版社，2010年。

17 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官网 <http://www.lsdag.com>。

都市内外城地图》是根据官方实测的全城各高程点编绘的详细地图,包含了北京内、外城范围的等高线¹。岳升阳主编的《侯仁之与北京地图》内含北京城四郊的地形图²。上述几份地图资料拼合,可以为构建元大都历史地理信息模型提供基础数据。此外,徐莘芳编著的《明清北京城图》³、李刚《近五十年元大都城垣变迁及保存现状调查》⁴也可为元大都遗址的定位提供参考。

侯仁之是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泰斗,其1949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在论及元朝都城时,突出了城市与水系的关系,并据此复原了元大都的城市平面,此书已于2014年出版中文版⁵。随后,侯仁之继续从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入手,系统地揭示了北京地区城市起源、发展、城址转移的过程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师生在侯仁之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北京历史时期的水系。如邓辉等复原了元代北京地区的原始湖泊水系、人工修建的白浮泉~高粱河~积水潭漕运系统和玉泉山~金水河~太液池宫苑用水系统⁷。岳升阳等对金口河遗迹的勘探,揭示了金、元、明各时期的金口河河道的变迁;对什刹海湖岸的演变的研究,明晰了元代海子北岸和东岸的范围;通过考古勘探,明确了古高粱河河道的走向⁸。

三 考古

元大都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北京城市建设而展开。王璞子根据人民大会堂施工时发现的府前街城壕遗址,确定了元大都外郭城南墙在今东、西长安街一线⁹。1964至1974年的十年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勘查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与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基本探明了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范围,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发掘了部分元代居住建筑遗址,形成了一系列考古报告。如1972年《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1973年《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等¹⁰。

赵正之遗作《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研究》,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和胡同基本上是元大都的遗存¹¹。主持元大都考古工作的徐莘芳证实了赵正之的观点,并提出依据历史地图和

1 以上三幅地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藏资料。

2 岳升阳主编:《侯仁之与北京地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3 徐莘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

4 李刚:《近五十年元大都城垣变迁及保存现状调查》,载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等:《北京学研究文集2006》,同心出版社,2006年。

5 侯仁之著,邓辉、申雨平、毛怡译:《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6 侯仁之:《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城市规划》1997年第3期。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7 邓辉、罗潇:《历史时期分布在北京平原上的泉水与湖泊》,《地理科学》2011年第11期。邓辉:《元大都内部河湖水系的空间分布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

8 岳升阳、孙洪伟、徐海鹏:《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岳升阳、马悦婷:《元大都海子东岸遗迹与大都城中轴线》,《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马悦婷、岳升阳、徐海鹏、张鹏飞:《汉代至元代北京什刹海成湖的地层证据——以小石碑胡同工地西壁南剖面为例》,《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3期。岳升阳、马悦婷、齐乌云、徐海鹏:《古高粱河演变及其与古蓟城的关系》,《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

9 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0期。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11 赵正之遗作:《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研究》,载《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科技史文集(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现存街道肌理推测元大都建筑群位置的方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元大都枢密院址考》、《元大都御史台址考》、《元大都中书省址考》、《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元大都太史院址考》等,获得了学界的认可¹。徐苹芳绘制的《元大都城图》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元大都遗址》,是目前比较权威的元大都复原图²。林梅村进一步补充了对元大都会同馆、中书省、钟楼市、宣徽院、太乙宫、南镇国寺的位置以及金水河水系走向的考证³。

除了北城墙和城门遗址外,现存元大都遗址还包括都城隍庙、海子水系、妙应寺白塔等。明清故宫及其周边范围内的元代地面遗存包括断虹桥⁴、浴德堂和大庖井⁵。考古判断为元代建筑遗址的地下遗存包括隆宗门西的元代建筑基础⁶、保和殿东庑外箭亭西的元代排水沟、神武门内的元代建筑基础⁷、东西护城河内河帮的元代条石⁸等。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元大都的整体格局逐渐显现,但对考古成果的判定,仍存在不少争议,需要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踏勘以及综合性的分析加以甄别。

四 建筑与城市规划史

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一直是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之间理论争锋,显示出这一课题广阔的研究前景。早期学者依据文献考证元大都规划设计思想和空间结果,如奉宽《燕京故城考》⁹,朱启铃和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¹⁰,王璧文(即王璞子)《元大都城坊考》¹¹,朱偁《元大都宫殿图考》¹²,王璧文《元大都寺观庙宇建置沿革考》等¹³,就是最早的几部关于元大都复原研究的著作。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对元大都的选址、布局、形制也有综合性的论述¹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直接推动了元大都空间布局和建城思想的研究,在都城范围、中心和轴线、布局以及建城思想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下面分而述之:

1 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 徐苹芳:《元大都城图》,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年。林梅村:《元大都西太乙宫考——北京西城区后英房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文物研究》,《博物院》2018年第6期。林梅村:《元大都南镇国寺考》,《中国文化》2018年第2期。

4 姜舜源:《故宫断虹桥为元代周桥考——元大都中轴线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林梅村:《元宫廷石雕艺术源流(上)》,《紫禁城》2008年第6期。林梅村:《元宫廷石雕艺术源流考(下)》,《紫禁城》2008年第7期。

5 单士元:《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王子林:《故宫浴德堂浴室新解》,《紫禁城》2011年第11期。

6 徐华烽:《隆宗门西遗址发现元明清故宫“三叠层”》,《紫禁城》2017年第5期。

7 白丽娟、王景福:《故宫建筑基础的调查研究》,载于倬云编:《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8 蒋博光:《紫禁城排水与北京城沟渠述略附:清代北京沟渠河道修浚大事记》,载单士元、于倬云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9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1927年第5期。

10 朱启铃、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第2期。

11 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6年第3期。

12 朱偁:《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13 王璧文:《元大都寺观庙宇建置沿革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7年第4期。

14 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新观察》,1951年第7、8期。

1. 都城范围

由于元大都的宫城、皇城、都城的长、宽数据在《辍耕录》中有明确记载：“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皇城）周回可二十里。”“（都）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明太祖实录》中也包含一些明初测量和改建元大都的数据。因此，确定元大都范围的难点在于明确规划之时所使用的尺度。早期学者主要从宫城数据推算元大都规划尺度，如朱启铃和阚铎在推算元大内平面时，取宋布帛尺1尺=0.283米为基本尺度，依照清代法式，推算出元大内与明清故宫基本叠合的结论。朱偁以1里=360步推演，认为元大内应为六里三十步，而非九里三十步。王璧文依据《辍耕录》中“里二百四十步”的记载，以1里=240步，将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与长“六百十五步”、宽“四百八十步”数据统一起来。

上述多种关于元大都规划尺度的推算，以王璧文1里=240步的观点与文献拟合最好。可以看到，这与通常认为的元代1里=300步不同，究其原因，应是在规划元大内之初，“制度结构，取法汴京”，在尺度上采用金制，以240步为1里。按照元1尺=0.315米，1步=5尺，1里=240步计算，“九里三十步”恰好是长宽为“四百八十步”和“六百十五步”的矩形的周长，说明《辍耕录》关于元代尺度和宫城的数据是准确的。然而，都城规划所使用的尺度，与宫城并不相同。元宫殿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规划建设，模仿金中都，使用金代尺度。而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则由刘秉忠负责，晚于宫城的规划，推断此时度量衡等制度已经完善，因此使用的是1里=300步的元里制。

在明确宫殿与都城规划采用了两套不同尺度之后，依据历史地图、考古成果、航拍照片等，可以确定元大都都城、皇城、宫城的范围和主要城门的位置。

2. 都城中心和轴线

元大都设置“中心台”标志都城中心，这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别具一格，中心台的位置又与中轴线、宫城紧密相连，历来是元大都规划研究的重点和争论的焦点。中心台的位置迄今不明，而中轴线的位置有武英殿轴线说、断虹桥轴线说、明清故宫轴线说三种说法。

自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开始，至近代奉宽¹、朱偁²、王璞子³，以及王子林⁴等都认为元大都中轴线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也就是明清中轴线的西侧武英殿轴线一线。但据此复原的元大内西北角，会侵入北海水面。北海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其岸线和琼华岛均以太湖石堆砌，据说是从北宋汴梁运来的御苑艮岳石块。元大内选址时，不会不考虑北海水面的影响。据此，武英殿轴线说可以排除。

姜舜源认为断虹桥即元代周桥，继而提出了元大都中轴线在断虹桥一线说⁵。但新近考古勘探表明，断虹桥实为明初所建⁶。据此，断虹桥轴线说可以排除。

另一方面，赵正之指出元代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元大都的考古勘查也支持这一观点。侯仁之⁷、单士

1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1927年第5期。

2 朱偁：《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3 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6年第3期。

4 王子林：《元大内与紫禁城中轴的东移》，《紫禁城》2017年第5期。

5 姜舜源：《故宫断虹桥为元代周桥考——元大都中轴线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

6 徐海峰：《古桥一隅寻踪迹——断虹桥桥头西南侧考古》，《紫禁城》2017年第5期。

7 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元¹、王灿炽²、姜东成³、王世仁⁴、郭超⁵、岳升阳和马悦婷⁶、张一指⁷、武廷海⁸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目前看来,明清故宫轴线说是比较可信的。

3. 都城布局

元大都的布局复原,主要采取徐莘芳所倡导的历史街巷比较法和“模数制”的推算法。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一文,复原了元大都宫城大明殿与延春阁建筑群的布局,详细列出各城门的尺寸及复原推算结果,并绘出重要建筑单体的复原图⁹。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对元大都主要功能区进行了复原,并注意到元大都规划采取了“八亩一分”的居住模式¹⁰。随后,傅熹年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一书,从“模数制”的角度对元大都整体规划与建筑群布局进行了探讨¹¹。姜东成综合前人研究方法,提出“元大都城市平格网”的概念,对元大都建筑群基址规模与平面布局进行复原¹²。

4. 建城思想

有关元大都建城思想的源头,目前形成了《考工记·匠人营国》(也称《周礼》)、《周易》和“象天法地”三种观点。早期学者如贺业钺主要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都城制度剖析元大都的规划思想¹³。黄建军和于希贤、马樱滨也对此说有更加深入的分析¹⁴。随后,部分学者注意到元大都规划更多受到《周易》思想的影响。潘谷西指出,元大都“不但不是复《考工记》之古的都城典型,相反,倒是一个充分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富有创新精神的都城建设范例”¹⁵。侯仁之进一步指出,阴阳五行学说和刘秉忠思想是研究元大都规划思想的关键,“过去讨论大都城的规划设计,着重说明的是以《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规制为根据,实际上两者之间仍有明显的差异”¹⁶。于希贤利用易学思想,详细探讨了元大都城坊名称、数目与《周易》象数的关系¹⁷。武廷海从刘秉忠思想入手,指出元大都规划秉承了邵雍“先天图”模式¹⁸。新近,元大都规划所蕴含的“象天法地”思想也得到重视。吴庆洲认为,“元大都以《周易》象数哲学为规划指导思想,另将宫城置于三

1 单士元:《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2 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3 姜东成:《元大都城市形态与建筑群基址规模研究》(博士论文),清华大学,2007年。

4 王世仁:《北京古都中轴线确定之谜》,《北京规划建设》2012年第2期。

5 郭超:《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郭超:《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中华书局,2016年。

6 岳升阳、马悦婷:《元大都海子东岸遗迹与大都城中轴线》,《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7 张一指:《恭王府风水大观》,新星出版社,2012年。

8 武廷海、王学荣、叶亚乐:《元大都城市中轴线研究——兼论中心台与独树将军的位置》,《城市规划》2018年第10期。

9 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10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1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12 姜东成:《元大都城市形态与建筑群基址规模研究》(博士论文),清华大学,2007年。

13 贺业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14 黄建军、于希贤:《〈周礼·考工记〉与元大都规划》,《文博》2002年第3期。马樱滨:《从理念到实践: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与〈周礼·考工记〉之间的关联》(硕士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15 潘谷西:《元大都规划并非复古之作——对元大都建城模式的再认识》,载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6 侯仁之:《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城市规划》1997年第3期。

17 于希贤:《〈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18 武廷海:《元大都规划猜想》,第4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2012年11月19日。

垣中之太微垣之位。太微乃三光之廷。三光为日、月、五星。太微垣实为太阳神之宫。这与蒙古人信奉的喇嘛教尊崇毗卢遮那佛即太日如来有关,也与蒙古人为东夷族的后裔有关。元人选择太微垣为宫城之位,不用北辰宇宙模式”¹。徐斌指出,根据《大都赋》和《析津志》的记载,元大都的规划布局基于岁首时刻天象格局拟定重要功能区位置”²。

由于元大都的南部叠压于明清北京紫禁城之下,无法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亟需引入新的材料和方法进行论证。在元人李洵孙《皇元建都记》(也称《大都赋》)及熊梦祥《析津志》等文献中,明确记载了元大都规划具有“象天法地”的特征;元大都的缔造者忽必烈崇天象、好占卜;总规划师刘秉忠具有“精通天文、地理、历律、易学”的知识背景;其弟子郭守敬不仅在天文学上卓有建树,而且参与了元大都的水系规划。这些,都为从“象天法地”视角研究元大都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材料。

元大都“象天法地”规划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天地对应”的空间模式来解释元大都的规划布局思想,因此,对元初天文图式的研究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虽然元代天文学的发展大放异彩,涌现出郭守敬这样著名的天文学家,但却没有传世的天文图。因此,只能依据前后时期的天文图,与《宋史·天文志》、《元史·天文志》等官方文献相互参看,并辅以天文复原软件 Stellarium,综合探求元代天文图的空间模式。

传世星图中,距离元大都规划时间最近的两幅绘制精良的天文图,分别是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藻井天文图³。(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经元、明初人翻刻增补,内含两幅比较粗略的天文图,也可作为参考⁴。关于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席泽宗考证为南宋黄裳所绘,但依据的是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观测数据⁵;潘鼐进一步校核了此图所绘的星象⁶。关于明代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藻井天文图,伊世同认为此图依据的是唐代星图⁷;而潘鼐则认为此图本自元、明官方天文图⁸。不过,上述争论并不妨碍关于此天文图的空间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南宋苏州天文图,还是明代隆福寺天文图,二者所反映的都是隋唐《步天歌》以来确定的“三垣二十八宿”的天空格局,与历史文献中关于元大都“象天法地”的记载是一致的。利用天文软件 Stellarium 的技术,可以精确地复原元大都规划之初的星空结构,弥补缺乏元代天文图实物的遗憾,通过比对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探究元大都的空间布局模式。

5. 相关都城规划研究

元大都与金中都近在咫尺,使用时间也基本前后相接,其宫城规划受金中都影响较大。蒙元时期还有其他三个都城,如窝阔台建于太宗七年(1235)的哈拉和林,忽必烈建于宪宗六年(1256)的元上都,以及海山建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元中都。其中,哈拉和林、金中都、元上都的规划,可能对元大都规划产生重

1 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2 徐斌:《元大都象天法地规划初探》,第9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2017年12月5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 [南宋~元]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63年。

5 席泽宗:《苏州石刻天文图》,《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6 潘鼐:《苏州南宋天文图碑的考释与批判》,《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7 伊世同:《〈步天歌〉星象——中国传承星象的晚期定型》,《株洲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 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

要影响；而元中都的规划，则可能反映出对元大都规划模式的继承。明代三都中，明中都、明南京紧承元大都之后修建，明北京则直接建于元大都基址之上。以明北京为主，研究元大都到明北京的空间变迁，可以为元大都规划复原提供有益的参考。

金中都考古发掘于20世纪50～60年代由阎文儒、徐苹芳主持，有关金中都的考古和平面复原工作可参见于杰和于光度¹、齐心²、侯仁之和岳升阳³等。

哈拉和林考古发掘，由前苏联学者C.B. 吉谢列夫在20世纪40～50年代率队开展，1965年即有研究报告出版。此书于2016年由孙危翻译为中文出版，是目前有关哈拉和林城的最为翔实的考古材料⁴。

元上都的考古和平面复原工作可参考魏坚等的考古报告⁵，以及张文芳和王大方⁶、陈高华和史卫民⁷、英国学者约翰·曼⁸等的研究。

元中都的平面布局可参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考古报告⁹，以及孙晓雯¹⁰、陈筱¹¹等学者的研究。

明中都的研究，以王剑英的成果为突出代表¹²。明南京的研究，可参看杨国庆和王志高¹³、杨新华¹⁴等的成果。明北京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其中涉及元明之际城市规划变迁的主要有贺树德¹⁵、单士元¹⁶、王剑英和王红¹⁷、李燮平¹⁸、陈晓虎¹⁹等。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上述多个都城的规划模式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如刘庆柱²⁰、刘未²¹、林梅村²²、包慕萍²³、陈怀仁²⁴、陈筱和孙华²⁵等。

1 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

2 齐心：《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载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齐心：《金中都宫、苑考》，《北京文物与考古》2004年第0期。

3 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

4 [苏联]C.B. 吉谢列夫著，孙危译：《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2016年。

5 魏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元上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6 张文芳、王大方：《走进元上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8 [英]约翰·曼著，陈一鸣译：《元上都：马可·波罗以及欧洲对东方的发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10 孙晓雯：《元中都营建之原因、过程与影响》（硕士论文），内蒙古大学，2013年。

11 陈筱：《元中都建筑遗迹的考古调查与复原》，《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4年第1期。

12 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13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

14 杨新华主编：《南京明故宫》，南京出版社，2009年。

15 贺树德：《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16 单士元：《明代营建北京的四个时期》，载于倬云编：《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17 王剑英、王红：《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宫阙的演变》，载单士元、于倬云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8 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19 陈晓虎：《明清北京城墙的布局与构成研究及城垣复原》（硕士论文），北京建筑大学，2015年。

20 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1 刘未：《蒙元创建城市的形制与规划》，《边疆考古研究》2015年第1期。

22 林梅村：《元大都形制的渊源》，《紫禁城》2007年第10期。

23 包慕萍：《从游牧文明的视角重探元大都的都市规划——从哈刺和林到元大都》，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建筑史学会2013年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包慕萍：《元大都城市规划再考：皇城位置、钟鼓楼与“胡同制”的关联》，《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4年第2期。

24 陈怀仁：《明初三都规划制度比较》，载郑欣森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25 陈筱、孙华：《中国近古新建都城的形态与规划——从元明中都的考古复原和对比分析出发》，《城市规划》2018年第8期。

五 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突破方向

总体看来,有关元大都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揭示出元大都规划和营建的过程、思想和方法。从现有的材料和成果来看,未来元大都的规划复原研究,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其一,元大内的规划复原。元大内的平面复原,已经积累了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而故宫博物院在多年的地基勘探和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掌握了一系列元代建筑基址的一手材料。新近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在故宫范围内发现多处元明时期的建筑基础,为探索元大内的位置提供了关键信息。二者结合,可以实现元大内规划复原的“落地”。元大内的位置,又与元大都的中轴线、中心台和钟鼓楼等位置紧密联系。因此,以故宫博物院考古材料为基础,以元大内的规划复原为突破点,是探索元大都的规划复原的有效路径。

其二,元大都“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历史文献反复记载了元大都的规划具有“象天法地”的特征。但目前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层面,缺少实证性的分析。而从“象天法地”视角研究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方法,已经在西周雒邑、秦咸阳、西汉长安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对于元大都这类考古不充分的遗址,积极开展“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将为明晰元大都格局开辟更加广阔的视野。

其三,从元大都到明北京的变迁。从元大都到明北京,先后经历了元大都、洪武北平、洪武燕王府、永乐燕王府、永乐西宫、明北京六个时期。其中,宫城部分的变化是最大的。由于元大内、永乐燕王府、永乐西宫的位置,历来存在争议,而明北京宫殿的位置则是确定的,因此,可以从明北京宫殿的营建和布局入手,向上推溯和梳理各个时期的空间演变,为复原元大内乃至元大都的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囿于语言能力,本文主要基于中文材料对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和总结。蒙元政权地跨欧亚,疆域广阔,与欧洲、中亚、阿拉伯、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都建立了密切的文化交往。遗存在这些地区的多种语言的历史文献,是未来探寻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新材料的宝库。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